


道善学苑

毓老师说

公羊

爱新觉罗·毓璠 / 讲述

陈纲 / 整理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毓老师说

公羊

爱新觉罗·毓璠 / 讲述

陈纲 / 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毓老师说公羊 / 爱新觉罗·毓璠讲述; 陈綱整理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9. 8

ISBN 978-7-5511-4812-2

I. ①毓… II. ①爱… ②陈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春秋时代—编年体 ②《公羊传》—研究 IV. ①K225. 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51884号

书 名: 毓老师说公羊
讲 述: 爱新觉罗·毓璠
整 理: 陈 綱

责任编辑: 林艳辉

责任校对: 梁东方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424千字

版 次: 2019年9月第1版

2019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4812-2

定 价: 8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前言

中国两部书——《大易》与《春秋》(《公羊传》)，绝不能自己看。你们听一遍后，将来老年回头看，就可以讲学。

不知《大易》与《春秋》，就不知中国文化。《大易》由隐之显，由体而用；《春秋》由显之隐，由用而体。天天于日常行事上，显；返回我们的性，隐，微。“克己复礼”，由人之道(诚之者)，至天之道(诚)，至天人境界(天人合一)，则“可以与天地参矣”(《中庸》)！

元，含乾元、坤元，“大哉乾元，至哉坤元”，坤顺承天，“至”，乃一点距离也没，乾元有多高，坤元就达到那般高；坤元就是乾元，乾元就是坤元。

人虽性善，但易受外诱之私。年轻荒唐，而立之年体悟，克己复礼，亦即复性，即由人事之用返回道(体)，“率性之谓道”。《大易》讲生生之道，是体，生生之谓易；《春秋》一切采之于礼，是用，《春秋》为礼义之大宗。

生生之谓易，生生就是仁。礼义即中，仁之用也，生之用也。礼义，中之用，《春秋》为礼义之大宗。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

谓之中”，中国，礼义之国，以礼义作为标准，一切裁之以礼义。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礼以和为本，“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太和。

《春秋》别嫌疑、明是非，而最难的是辨是非。孔子删《书》，《尚书》以《甘誓》作为划分，之前为法（以尧舜为始，王制之道为法），之后为戒（“至禹而德衰”的证明，乱制之道为戒），有所立义，一般人不讲，但今文家很重视此篇。甘之战，首反乱制之战，存此篇意义深长，天不佑扈，他这一败，几千年家天下乃起，天民尽制于鸟兽之群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云“有扈氏为义而亡”。

乱制之下人民受苦，应起而拨乱反正，孔子乃删《诗》《书》、订《礼》《乐》，其修《春秋》必有所为。故《尚书》与《春秋》相表里。《五经》皆相表里。

《春秋》讲思想，思想难以毁。“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，即指《春秋》。《春秋繁露》（以下简称《繁露》）、子书讲术。

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与历史不同，“其义则丘窃取之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是借事寄义，皆为况，是经。“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，孔子在史实之外，另立新义，后人称《春秋》为经。

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在未修之前必有一部“不修《春秋》”，以之作为依据；“其事齐桓、晋文，其义则丘窃取之”，修《春秋》后，史实无变，“义则丘窃取之”，成为修的《春秋》。

按己意写史，往往难为人接受，与史实距离远，乃有爱史

实者按史实传之，故有“不修《春秋》”。《左传》为保存真的历史，又称“不修《春秋》”，以《春秋》为史。《左传》作者左丘明，与孔子为同时代人，以孔子修《春秋》为索隐行怪，为了保存《春秋》史实，保存历史原貌，故详于事。自《论语·公冶长》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”，以及《述而》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”看出，孔子有两个崇敬的人：左丘明、老彭。

《春秋》有三传：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重义，《左传》重事。《公羊传》，修的《春秋》，继孔子之义，微言大义在其中。修的《春秋》称经，重义者为经。

读书要了解义，才有趣。过目成诵，皆不成器。哪个成功者是天才？要下功夫。

《穀梁传》在《公羊传》之后，与《公羊传》颇有近似之义。《春秋》三传，经皆同，均为口说，其后方笔之于书成传。传，谓解说经义者也。

今古文之争，专制时代以为是“文字”不同，实则为“思想”之争。伪古文，乃汉后为维护帝制的文人造出的。今文家一抬头，就起革命。

“公羊学”讲的是思想，要重思想演变的程序。思想影响一个人极重要，用智慧启发智慧，找出一条可行之路。读“公羊学”必要勤，不然读不下去。

“《公羊》由子夏口授，传之孔子，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，惟《公羊》得其传焉”，《公羊》传授即师承。

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，东汉何休（129—182）注。何注并

不难，必要耐心地读。但注中有些讲乱制，要勾去。

伏生（即伏胜，口述《尚书》，诸儒以汉隶录之，故所传曰《今文尚书》），今文家祖师。何注必要细看。《说苑》《白虎通论》《新序》皆汉初文，与何休的笔法同。汉用《春秋》决狱，影响最大，所以汉儒的书，如《新序》《论衡》也要看，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。

“《春秋》纬多与公羊说比附”，故熊十力（1885—1968）以纬书得今文家说为多。

—— 讖者，诡为隐语，预决吉凶。纬者，经之支流，衍及旁义。七经纬，即《易纬》《尚书纬》《诗纬》《礼纬》《春秋纬》《乐纬》《孝经纬》的统称，篇目极多。

《论语讖》，共八篇。在汉代，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本不属于经类，而属于“传、记”类，地位低于《五经》，所以不列入经典。但它记录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，在儒家书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，所以也为它造了纬书，因为不是经，所以不能称纬，而称讖。

汉时是讖纬之学最兴盛，尤以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为盛。魏晋以后，玄学兴起，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，讖纬之书渐遭毁禁。至宋后，讖纬学说更是式微，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。

清代陈立（1809—1869），凌曙学生，其《公羊义疏》讲考据，微言大义少。

陈立少时客居扬州，师事凌曙，博稽载籍，凡唐以前《公羊》大义，及清代以来诸儒说《公羊》者，左右采获，选精择详，草

创三十年，书写成长编的巨作，当他南归后乃整理排比，融会贯通，撰成《公羊义疏》七十六卷；《清史·儒林传下》称此书“渊雅典硕，大抵考订服制、典礼及声音、训诂为多”。陈以汉学手段治《公羊》，此乃乾嘉以来汉学之门径。

清人到处抄书，材料丰富，太平时代写了很多本子，有时还没说出哪个对，大杂烩也。

熊十力讲的是智慧之学，陈立疏缺少微言大义。旧社会，师说不笔之于书，怕祸灭九族。

清中叶，常州公羊学兴，以常州人庄存与（1719—1788）、庄述祖（1751—1816）、庄绶甲（1774—1828）、庄述祖外甥刘逢禄（1776—1829）及宋翔凤（1779—1860）为代表。清代公羊学复兴，肇始于庄存与，有《春秋正辞》十一卷、《春秋要指》一卷及《春秋举例》一卷，犹存乱制，但隐藏微言大义。庄存与今文家东西没能完全把持住，刘逢禄较好，著有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》（以下简称《何氏释例》）三十卷、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后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后录》）六卷、《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》一卷及《答难》二卷。

刘逢禄以《春秋公羊传》诠释《五经》要义，将公羊学扩及今文经学的全面研究，对当时及清末学术界起了莫大的效应。其《公羊何氏释例》云：“故不明《春秋》，不可与言《五经》。《春秋》者，《五经》之筦钥也。”刘氏将《五经》之要义与公羊学相互参证，实为清末公羊学的肇端所在。

凌曙（1775—1829）问学于刘逢禄，著有《春秋公羊礼疏》《春秋公羊礼说》《春秋公羊问答》及《春秋繁露注》等。

凌曙之学，本于《礼》及《春秋》，首创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学之中，以公羊学诠释《五经》，远承董仲舒阐扬公羊义理的精神，再振董氏以《公羊》援经议政。其《公羊礼说》《公羊礼疏》《公羊问答》《四书典故核》《群书答问》皆以公羊学的精神来阐发礼义之要旨。尤其《春秋繁露注》更开启研究公羊学的另一扇门径，梁启超谓“晓楼传庄、刘之学，谙熟公羊家法，故所注独出冠时”。

孔广森（1752—1786）著有《大戴礼记补注》《礼学卮言》《经学卮言》等，其《春秋公羊经传通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义》）十一卷，毛病多。

孔广森受业于戴震，从庄存与习《公羊》，又心仪郑玄，名其书房“仪郑堂”，颇致力于训诂考据，从而以朴学解释《公羊》，开启清末公羊学者以《孟子》释《公羊》的先声。

清儒读书多半好古，讲许多例，但不讲微言大义。

清末说经较为客观、平整的是皮锡瑞，有《师伏堂丛书》及《皮氏八种》，其《经学通论》有关《春秋》部分为师说，但有不同。《经学历史》可暂时不看。

皮锡瑞因景仰西汉初年传授《尚书》的伏生，故名其书斋曰“师伏堂”，学者称其“师伏先生”。皮氏以为尊孔必先明经，谓“孔

子不得位，无功业表见，晚订六经以教万世，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。自天子以至于士庶，莫不读孔子之书，奉孔子之教……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，为生民所未有，其功皆在删定六经”。

陈柱（1890—1944），唐文治的门生，著《公羊家哲学》，纳公羊大义为十五目，但太简。

民国以来，皆有目的地讲今文学。讲学有目的就低，学术本身是无所不包的。廖平（1852—1932）自谓：“为学须善变，十年一大变，三年一小变，每变愈上，不可限量。”其讲学有目的。号六易。康南海（1858—1927）有目的地讲学，借古书发挥己志，假孔子之名，行自己的主张。臆说，成己之私见，不算学问。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论《春秋》部分，犹能守一点家法。

要用智慧看中国东西，不同于迷信式。

熊十力《读经示要》（1945）有关《春秋》部分要看，所论高于今文家。《原儒》是1956年在上海时所写，与前书的观点不同，如以董子讲乱制之学。

熊十力《读经示要》以“西汉《公羊》之学，董氏为盛……东汉人又重胡毋生之学……何休作《解诂》，虽云依胡毋生条例，而义据亦大同《春秋繁露》，故治《春秋》者，当本之董何……使两汉无董何，则《公羊》之学遂绝，而《春秋》一经之本义，终不得明于后世矣”。

《原儒·绪言》谓：“六经皆被汉人改窜……汉武与董仲舒定孔子为一尊，实则其所尊者非真孔学，乃以禄利诱一世之儒生，尽力

发扬封建思想与拥护君主统治之邪说，而托于孔子，以便号召。”

《春秋》用殷历，值元述志。

孔子志在《春秋》，故《春秋》之志即孔子之志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善教者，使人继其志。”此志，乃祖师爷之志，即孔子之志。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义则丘窃取之”，此义，乃孔子之义。“吾因行事，加吾王心焉”（繁露·俞序），注意“吾”字，孔子用《春秋》之义表其志。

古书难懂，因历代皆有改经以合其时代思想，如宋儒之改经，故经书的真面目难求。

在专政政体下，往往以“今不如古”，净神化古人，此为愚民政策的第一招，使那时代的人亦步亦趋学古人，而失去了自我。

孔子思想，“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配合“有教无类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正与“愚民政策”相反。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父母的好坏，并不影响子女的纯正，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封建思想异于孔子思想，故要拨乱反正。

改革社会，要不惧恶势力。英雄怕太太，此外谁也不怕。不要找事，但有事不要怕事，得行正走正。怎么树威？抓住理不让人，但不打乱仗。事来不躲，得面对之，解决之。问题永远躲不了，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。愈怕事，人愈欺你。骂人，也要有机术。

要养成群德，花好亦需绿叶扶。吃小亏能树誉，有容人之量。理事，脑子要灵活。

《春秋》讲“拨乱反正”。拨乱反正，“必也正名乎……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正名，必有其名，然后再下功夫。索隐行怪，标新立异，均不能成事。不必求创新，纠正社会既有的就足矣。

正，王道也，中国倡王道，“王，天下所归往”，即归往之道。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”，霸必有国大，霸者难永存，因为有敌人，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”；王者无敌，“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尧舜为王道，政治上的模范，“仲尼祖述尧舜”（《中庸》）；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亦讲王道。

讲王道，必有王制，《礼记》、子书均提及，但都与乱制混了。孔子倡王道，讲王制，是新王之制，公天下之制；有别于旧王之制，家天下之制。王制与乱制，相对。

“文家尊尊，质家亲亲”（何休语），尊则笑贫不笑娼，怎能不忘本？文，饰也，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；亲亲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，是有理智的，由近及远。周尚文，殷尚质；《春秋》则变周之文，从殷之质。此周、殷，皆况。

为文，必须考虑别人能看懂否，不是要保存。我看书，必了解了，再批评。有志，空的不行，自己必得升华。读上三年书，应自己能读书了。

我在屋中读五十年书，除孙女外，谁都不应付。

以蒋庆《公羊学引论》（以下简称《引论》）作入门，但并非金科玉律，我订正很多。作者年轻，至少没走错路，有厚望焉。

做学人、文化的领导人，必要脚踏实地读书，先把自己点亮了。中国人都应了解中国文化，研究中国文化绝不能兼差，还得智慧不错的。医书比经书还难，今天中医的针灸、麻醉震惊全世界！

真想做学人，得自己真读书，我也帮不了忙。修业，就是修，才有学问。学、习、修：学而时习之，学了就习。但仍有偏差，必要修之。天天学习，但结果有别。不论好什么，也得修。

“率性之谓道”，根据标准修一修，懂标准——性，就知怎么修。修，去掉没用的、不合标准的。修史，历史是一阶段一阶段的记录，把与大道无关者去之。

“修道之谓教”，教（jiào）为名词，教育；动词，教（jiāo）人，传也。学、习、修的原动力，在传。学什么，都有一定的理路。理路必要清楚，否则怎么走路？传，也分很多层次。传承、传习、传统。

传承，我传的是什么？你们承的是什么？传学，承学，是专修的那一部分。传习，“传不习乎”？自己干什么不知，岂不是盲人瞎马？我并非有人格，不做狗扯羊皮的事，因为没有用，即使日进斗金，生活也不会改变。传统，你们都得了，是自老祖宗留下，一直演进到今天的。

笔记要整理，否则如杂货铺，最慢明天就要整理。得随时发神经，想到就写。作书，将时时刻刻想的结晶凑在一起。什么也不整理，怎么进步？不勤，绝对不行。如听戏，台上三秒钟，可是台下十年功。我昨天讲《易·屯卦》“六二”，乃前人所无，自《小象》“六二之难，乘刚也”印证的。

在台五十年，如无一个明白的，岂不白忙！写读书报告，

才知你们懂否。再怎么乱，最后也得归于平静，这时就看实力、真功夫了。有正确观念了，就知怎么奋斗。女子肯用心，在厨房也能成家，诗、词将心里话说得明明白白，叫人懂。

曾约农（1893—1986，曾国藩嫡系曾孙）有学问，但不讲学。孔德成（1920—2008）两个老师：丁鼎丞（1874—1954）与李炳南（1891—1986）。

孔家正统随宋室南渡，在衢州（位于浙江省西部，钱塘江上游）。康熙帝分南、北二宗，因不能打祖宗的脸，多花点钱成立二宗，此即“干祖之蛊”，补过。此乃人生要道。我到曲阜住一周，深思熟虑怎么解决问题。

我这支是太祖嫡子礼烈亲王代善（1583—1648）之后，正红旗。人要自觉才能成才，我“长白又一村”。想怎么样没用，得怎么样才有用。

“学”与“统”有何区别？通人，承统；专学，承学。有《学统》一书，可以参考。《春秋》讲一统，又称“元经”。重视根，本是同根生。代代相承文化的责任，所以“素王”比“时王”尊贵得多。

文王，何休注“法其生，不法其死”，人人皆为活文王（周文王为死文王，谥号）。《论语》“文没在兹”，每个人都有“文”，即性之用，亦即“道”。“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：文道，“纯亦不已”（《中庸》），行健不已；武道，“止戈为武”（《说文》），“全敌”（见《孙子兵法·谋攻》全国、全军之说），“聪明睿智，神武不杀”（《易经·系辞上传》：“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”）。武，止戈，研究怎么不动武。一统，元统。用什么可以不发生战争？唯中国人有这个智慧与能力。

中国讲“天下”，不讲“际”“界”，“天下为公”“天下一家”。得用中国思想，看中国人的“天下观”是多么进步，将星球都包括在内。

秦时，李冰（前 256—前 251）担任蜀郡郡守，在蜀郡修都江堰，现仍维新，经两千多年了。何以都江堰能够历久弥新？智慧产物是颠扑不破的，后人加个“神”字，乃因猜不透。今科学家犹不真懂。李冰父子治水，顺水找水源，研究水文到“神”的境界，被称为“二郎神”。今天研究中国思想，比李二郎找水源方便得多。

今天生活安适，何以不关门好好做学问？一天不知为什么而活，难道不会不舒服？千言万语，就是要自觉。笨，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；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刚。笨并不可怕，肯努力就没有“愚”与“柔”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人心实比天地宽。

《春秋》思想，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的智慧，必慎思之、明辨之。真明白，三年绝对有成。一切之始，另辟天地，值得传承的以“性”为标准，要承、传。

读《公羊》前，有些重要问题要先了解。

一、《公羊》传承

《公羊》由子夏口授传自孔子，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，惟《公羊》得其传焉。

公羊者，传者之姓氏。旧疏引说题词云：“传我书者，公羊高也。”公羊高，子夏弟子，五传而著竹帛，弟子不敢斥言师名，故以氏传也。

“十三经注疏”中的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（又称《公羊旧疏》，

下简称“旧疏”),二十八卷,不知何人所著。不著撰人名氏,或云徐彦所作,不知何时人。其书在隋并亡,而《唐志》有之。今疏中有问答……按问答语甚精贍。

《公羊》传文,初不与经连缀。《汉志》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各自为卷……汉初为传训者,皆与经别。古者经传异本,汉古经《公羊》有传无经。故蔡邕《石经公羊残碑》无经……后儒省两读,始合并之。分经附传,大抵汉后人为之。《开成石经》始取而刻石焉。

二、何休学

《博物志》曰:何休注《公羊》,云“何休学”。有不解者,或答曰“休谦辞受学于师,乃宣此义不出于己”。《论语讖》云:“语‘学’者,识也。盖谓有所得即识之。”

《拾遗记》曰:“何休,木讷多智……作《左氏膏肓》《公羊墨守》《穀梁废疾》,谓之三关。”

三、三科九旨

公羊家旧有三科九旨。《春秋说》云:“《春秋》设三科九旨者,其义如何?答曰:何氏之意,以为三科九旨,正是一物(事)。若总言之,谓之三科,科者,段也;析而言之谓之九旨,旨者,意也。”

何氏作《文谥例》云:“三科九旨者,新周,故宋,以《春秋》当新王,是谓一科三旨。所见异辞,所闻异辞,所传闻异辞,是谓二科六旨。内其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,是谓三科九旨。”

宋衷注《春秋说》，为另一种说法：“三科者：一曰张三世，二曰存三统，三曰异外内，是三科也。九旨者，一曰时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王，五曰天王，六曰天子，七曰讥，八曰贬，九曰绝。时与日月，详略之旨也；王与天王、天子，是录远近、亲疏之旨也；讥与贬、绝，则轻重之旨也。”

孔广森《公羊通义》，遗何氏而杂用宋氏。其说云：“《春秋》之为书也，上本天道，中用王法，而下理人情……天道者，一曰时、二曰月、三曰日；王法者，一曰讥、二曰贬、三曰绝；人情者，一曰尊、二曰亲、三曰贤，此三科九旨者既布，而一裁以内外之异例，远近之异辞，错综相须成体是也。”

九旨：在《春秋》常用的几个观念。

五始：元年、春、王、正月、公即位。

七等：州、国、氏、人、名、字、子。

六辅：公辅天子，卿辅公，大夫辅卿，士辅大夫，京师辅君，诸夏辅京师是也。士，事也，最低公务员。士大夫阶级，乃士至大夫。

二类：人事与灾异。

七缺：《春秋》有七种缺德的事：为夫之道缺，为妇之道缺，为君之道缺，为臣之道缺，为父之道缺，为子之道缺，周公之礼缺。

四、存三统

存三统，夏、商、周。因三统，才知有所“因”，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